我的“大乡音”

姚锡娟

我出生在上海，上海话是我的乡音，我对上海的故乡情结浓得化不开。1962年离开上海前夕，我穿了一套浅黄色的衣裙去与同学告别。刚走到淡水路口，一个“野蛮小鬼”突然拿起地上晒着的半干煤块扔到我身上，洁净的衣裙顿时染上了黑印。我又急又恼，流着眼泪对他说：“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，你还对我这样？”那小鬼哪里懂得我的乡情，早就逃之夭夭了。

我的祖籍并非上海，而是安徽歙县。我的母亲是歙县定潭人，幼失怙恃，与我舅舅一起投奔上海的叔公，故能说得一口老式沪语。我的父亲出生在歙县深渡镇，那里有一段民谣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。”所以我父亲读完私塾就随我二伯离乡别井到武汉、上海“学生意”，吃尽千辛万苦，最后立足上海，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。他对故乡也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情结，不仅在家保留了深渡的乡音和节俭的生活习惯，又尽力去家乡做公益善事，对子女也不忘传承徽州的文墨书香。我能听懂父母的家乡话，爱吃家乡的“塌稞”，可对徽州知之甚少。

广州于我更是个遥远和陌生的地方！初到此地，就给她的方言难住了。原来我在上海，江浙一带的方言学起来也快，英语也不曾难到我，可广州话，就那个“香”字我都不知该从哪个部位发出来！“算了，不学也罢！”作为一个话剧演员，自己的普通话都带着上海口音，如果再学白话，有了广州话的尾音，那还了得！慢慢地我能听广州话了，能少少地说两句了，有的字还说得很准。我就尝试着连贯地讲，可一连贯着讲就会荒腔走板变成宁波话。从此只敢讲不超五个字的粤语，甘心做一个“识听唔识讲”的外来妹。多年后发现，原来“落雨”等好几个词的发音广州话和上海话是一样的呀！然后呢，在上海对广东的足球比赛中肯定助上海队的我，成了“中立派”……

2002年五一前夕，我与哥姐们在上海启程，坐着中巴驶向安徽歙县，去拜祭111岁的父亲和100岁的母亲。途中时雨时晴，到达歙县已是傍晚。歙县的春天又闷又热，不仅汗湿了衣衫，就连宾馆的地上都冒出水来，就似广州的回南天一般。也许是父母地下有知，念我们兄妹长途跋涉之辛苦，次日就放了个大晴天，地上也干爽了。我们在亲戚的陪同下，手携祭品，走过田间，行过山路，来到亲爱的父母坟前，焚香烧纸，洒泪行礼。

年近八十的大哥，故乡情深，第二天还记挂着在附近游览一番，我却因劳累，意兴阑珊。第三天，吃完早餐就直奔深渡镇。深渡镇美称千年古渡，我四岁时曾随母亲兄姐逃难至此，住过半年，但记事不多。1993年兄妹六人送父母骨灰回乡，才看到故乡是这般的山清水秀，令我过目难忘！

车到深渡镇，一条大江呈现在眼前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新安江。我父亲的出生地不在镇上，而是在江对岸的小岛上——凤池村，那真是个与她名字相符的美丽小岛啊！与1993年不同，家乡这个宁静秀美的小镇，已成了热门的旅游胜地了。这里游客众多，可是我的耳朵却在嘈杂的南腔北调中，听到了熟悉的“乡音”，那是我万般思念的“爸爸妈妈的乡音”。我精神一振，快步走向江边。啊！1993年还是一个大斜坡的堤岸，现已建成一级级的阶梯，抬起头来，居然还有缆车直达对河。再低头一看，清清的河水中却漂浮着不少果皮、塑料袋……顿时，护乡情切，急匆匆跑去管理处反映意见。再下堤岸准备摆渡去凤池时，看到一个小姑娘和一位妇女坐在岸边，依稀觉得小姑娘有点像我儿时模样，便上前与她们搭话。见那妇人双目失明，说也是凤池的姚姓人。我激动地罗列出家乡几位前辈的名字，问她们是否认识？那妇人如数家珍用深渡话一一道来，我全听得懂，并连连点头出声应答。站在我对面的大哥笑得前仰后合地说：“你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？你在与她说广州话啊！”

我回过神来，可不是吗？我竟用广州话在应答她：“嗨啊，嗨啊！”浑然不觉。我也前仰后合地笑出眼泪来了！

深渡话、上海话、广州话，纠缠融合，模糊了界限，抑或这就是我的大乡音吧……

孤独的海边图书馆

吴 骊

三联海边图书馆，被称作“最孤独的图书馆”。它孤零零地矗立着，仿佛一个物体被放置在沙滩上，连道路都没有。线性的排列结构令整个建筑显得狭长，绵延数百米空无一物的沙滩，令它与海的关系更加抽象。混凝土的外观隐然已经有了风吹日晒的斑驳。南戴河的海是凝重的铅灰色，即使风和日丽，蔚蓝天色的下摆也带着一点灰，若有似无地融进了海水之中。这座图书馆也是一样，灰褐中泛着白，融进了雾霭蓝的天幕中。

因为没有路，只能踩着沙滩进入图书馆。虽然海水沉浊，沙质却细软，待得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图书馆门口时，鞋里多多少少落了沙子。进门之前，须得把鞋子清理干净。当时想，这低头整理的片刻时光，算是我为尊重建筑和书本的些微付出吧。回来翻看建筑介绍，才知道原来建筑师与业主就筑路意见相左，悬而未决，人们只能踩着沙滩走进图书馆，成为体验的一部分。我个人是喜欢的。这一小小的仪式，把这栋建筑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走进图书馆，最先入眼的自然是及地玻璃窗外的海景。相比户外无遮无挡的海天一色，隔窗相望改变了空间的设置，令海与人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。置身于外，这栋建筑仿佛是搁置在海滩边的一具物体；身在其中时，却是嵌入窗内的海被物质化了。区别只是一个坚硬，另一个柔软。

然后，我才注意到了书。通透开阔的上下大平层，深棕色的木质长桌长椅一字排开，书架靠墙而立，里面满满塞着各类书刊。书刊选择的品位虽不令人惊喜，但也不俗。毕竟，这是一个为社区服务的图书馆，以家庭为单位，需要兼顾男女老少各类爱好。

孤独的图书馆内人头攒动，完全没有被铅灰色北方海水浸润过的凄清之感。图书馆是面海设计，落地玻璃窗前摆放了一长排藤椅，正对着窗外的海天一色，甚是惬意，早已被占得满满当当。大约是天气晴朗讨喜，连看书的心情都一并明朗起来了。父母带着小孩，年轻情侣流连忘返；虽有工作人员管理严格，时时刻刻督促戴着口罩，然而川流不息的人群间，时时的孩啼与恋人间的窃窃私语，总是不可免。我避到了书架后方，选了本夏目漱石的《我是猫》，倚在柜子边上翻看起来。日本作家的作品，再是烟火气，都透着清冷和疏离，正好化解周边的喧嚣。

因为不能脱口罩的缘故，翻看了一会儿，我觉得气闷，于是抬起头望向窗外。窗外是灰蒙蒙的蓝，艳阳天也显得凄清的北方海景；窗内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脸上绽放着终于放风的喜悦，与这含混的海景莫名地和谐。寂寥与世俗相互衬着，微妙地融为一体；在这样特殊的时期，一座孤独得连路都没有的建筑里，欢欢喜喜地蒸腾出一股奇异的热闹，一种压抑之后才会有的绽放。我也不禁微笑起来。

前疫情时代，一年快过一年的节奏，大约没人会停下来抚摸一下自己的内心，总是一件事情还没忙完，又有十件堆了上来。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让每个人原本掩盖在闹哄哄表象下的孤独，骤然鲜活起来。面对尚不可预知的未来，原本已在网络上过惯了独居生活的人们，终于想要真正的触碰和拥抱。《鼠疫》里写到当疫情终于得到控制，奥兰城开放的那一刻，“终于人人都高声叫嚷，开怀大笑。几个月以来，他们每人守护心灵而积存的生命力，现在要在这一天中耗尽，真把这一天当作他们的幸存之日。等到明天，生活本身才倍加谨慎地开始。眼下，不同身份的人相聚甚欢，情同手足。”痛苦结束了，遗忘尚未开始。

边看边聊

恍惚了片刻，我放下手中书本，走出了图书馆。正午阳光下，它好似一块单纯坚硬、正在慢慢风化的石头，孤身面对宏大阴郁的海。

而几步之遥的沙滩上，孩童一边在打着滚玩沙，一边拉着在旁的年轻父母一起嬉闹；成群的叔伯阿姨走过，一路洒下北方人特有的爽朗的大笑声。更有不少女孩，应该是精心打扮了，特来此地和图书馆合影。一切明朗，终于是这样活泼泼的人间。

我转身，举步往前走去，在沙滩上踩出一串足印。只愿未来也是这样的有声有色，不再空虚。

最后悔的棋

师 者

“你最后悔的棋是哪一手？”暑期班里给一个孩子复完盘，我信口问道。作为指导老师，今天怎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？也许，我只是在问自己？

最后悔的有时候不是一手棋，是一个动作：

那年我在韩国打团体赛，关键轮次猜到黑棋，棋局始终胶着。终盘前，我清点了几遍目数，都是黑盘面七目（中国规则黑贴七目半）。我去洗手间抹了把泪，回来按停计时钟，示意认输。围观的队友当场炸了，他们告诉我：这次比赛采用的是韩国规则，黑贴六目半！我一个动作，送走一个团体冠军。

最后悔的有时候不是一个动作，是一段人生：

九岁，在母亲的陪同下，我来到北京学棋。租了个九平方米的“鸽子笼”，没有窗户。先后辗转于北京各大道场，参加了八次被称作围棋高考的定段赛，均无功而返。直到十八岁我超过了当时的定段年龄上限。从北京退租，回到上海的那天我走得很利落，没有回望一眼那间幽闭的房间，那段幽闭的人生。只是偶尔在夜晚，仰望星空璀璨，我会想，有多少颗星淹没在无尽的黑暗里。

最后悔的有时候不是一段人生，是生错了时代：

22岁那年，国家放宽了定段年龄，我第九次出现在定段赛场上，在放松的心态下，圆了少年时的梦。

2016年人机大战前，我和朋友说笑：如果李世石输了，我把棋盘吃掉。几天后，上海某蛋糕房接到了电话：定制棋盘蛋糕。

如果说围棋的历史依靠时间节点划分，2016年这个确切的年份，将历史一分为二：之前是一个世界，之后又是另一个世界。人工智能好像棋盘上的电子导航，现在看比赛，带着上帝之眼。棋手还在思考，屏幕上早早跳出了最优解，次优解。棋手走出了推荐的一手，大家纷纷点赞：不愧职业的；棋手走出推荐外选点，大家整齐划一报出掉了多少点（胜率）。职业围棋比赛成了与人工智能对答案的游戏，人们对职业棋手不再虔诚，不再敬畏。当个人价值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，我有时会觉得，在围棋世界的版图里，自己是个多余品……

孩子脸涨得通红，眼睛里好像有些晶莹随时会溢出。我又问了遍：“你最后悔的棋是哪一手？”对面突然抽泣起来：“老师，我没有悔棋！”我瞬间明白了这是个误会——提问：最/后悔/的棋；回答：最后/悔的棋。

不是我在呵护、关爱这些孩子，相反，这些孩子在给予我童心的馈赠。他们纯净的心灵，总能发现成人粗糙的双目忽视的变化。

我们的童心呢？在生命流程中和浑浊、功利、欲望交换了吧？这天，我在自己的生命画册里，悄悄添置了新的索引，新的页码。

趁着低沉夜色，我回到了居住的老旧小区。门口的霓虹灯虽然残破，仍然固执地闪烁。

菠萝蜜的旅途

蔡 旭

一列慢车从粤西开往华东，行进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夏日。

行李架上，一件旧报纸包扎的长椭圆形物体，引起了旅客们的关注。列车员闻讯走来。我的老乡遵令打开，一个表皮黄褐色有坚硬瘤状凸体的巨型怪物，顿时照耀了整节车厢。

一股成熟的果香，即在桂湘赣沿路飘散。旅客们似乎都不识此为何物，当然我太熟悉了。这就是菠萝蜜呀。就是我们茂名家乡的热带果王呀。

那时我在上海上学，同行的老乡想把它带给研究所的同事品尝。可是列车走入浙江地界时，它的香气似已无法忍耐，很快就把车厢的空气感染了。天气太热，果肉已经烂熟。再不及时分享，它就会变坏了。

老乡从列车员手中接过刀具，就在众目睽睽下把它当场破开，一包包金黄发亮的果肉纷纷出场亮相。见者有份！整个车厢的男女老少，都分享了意外的惊喜。

我和老乡，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它的吃法。至于它特有的美味就不必多说，谁吃了谁有体会。

那种又香又甜的滋味，柔滑清爽的口感，应会长久难忘吧？

那种热带风味与气息，回味无穷的感觉，也会经久不散吧？

那种原始的、本真的清甜，说不定还会一口定终身，成了很多人的心头之好……

也许会让老乡的同事们失望了。

可是，能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旅人，见识了故乡的热带果王，毕竟也是一件可以填补遗憾的幸事。有机会向外界推介了特产，推介了故乡，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呀。乃至50多年后，对此事我还记忆犹新。还禁不住，津津乐道。

七夕会

有一种爱

周优泽

2020年的中考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推迟，6月27日、28日如期而至。不同以往的是考生们都戴上了口罩，并按要求签了考生考试安全承诺书，送考的家长们写在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充满期望，我作为其中一员，有些莫名的激动，甚至湿润了眼眶。

与往年一样，上午语文考试还没结束，“上海发布”就公布了今年的中考作文题目：《有一种甜》。作为十四五岁的孩子，不管是苦还是甜，都已经历了不少。我想，在苦与甜的背后，始终有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各种爱陪伴着他们成长，父爱就是其中一种。

我在儿子进入初三学习后，就尽量早回家多陪伴他，当我在家时，他烦躁的情绪会好些，可能因学习压力大而产生的脾气也会消散。考前在家复习的两天，我特意请了公休，一是帮他查漏补缺，二是帮他舒缓紧张的情绪。早上陪他去考点，边走边最后一遍委婉提示帮他放松心理。到了考点门口，突然背后冲过来一位中年大汉，火急火燎，脸上挂满汗水，在行色匆匆中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盼着什么，我一看，是儿子同学的爸爸，马上跟他打招呼：“你们也这么早！你儿子呢？”他一边与我们往校门方向同行，伸着头左顾右盼，一边喘着气回答我：“不谈了，这小子，早上跟我吵了一架，然后说不要我送考了，如果我坚持送，他就不来考试，就让他妈送了。但我还是不放心，赶过来看看，估计已经进考场了，哎！怎么生出这样的小子……”我刚想劝他莫生气，一转眼他的身影已经钻入人群中。

中午临近考试结束，我去考场门口等儿子。考试结束铃声响了，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，此时，从我身后传来“咔嚓、咔嚓”的拍照声，我扭头一看，一位身高超过一米八、戴着眼镜、穿着雨衣的中年男子，手里拿着一个镜头很长的相机不停地按下快门。我就问他：“你是记者吗？在拍谁？怎么不在学校正门口拍？”他满足又小声地跟我说：“呶，我给儿子拍几张照片留念，他不肯。我就偷偷地过来，躲在远处给他拍几张！”声音很轻，相信除了我和他，没有第三个人能听到，更别说从我们视线里逐渐远去的他的儿子和接考的妈妈、外婆了。接到儿子后，我把刚才一幕告诉儿子说：“这个爸爸也挺有意思的，与其为了将来留作纪念拍照，还不如亲自送考、留在自己记忆里更有意义呢！”

回家路程虽然不到一公里，但雨很大，我开着助动车慢慢前行，好几次停下来擦掉满是雨水的眼镜，突然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儿时的画面，同样戴着眼镜的父亲经常雨天骑着自行车回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：很严肃地用衣角擦拭眼镜。中午安顿好儿子休息后，想想上午遇到的几位父亲，会心一笑：作为父亲，对孩子的爱往往表面显得很冷，其实内心很热，有时还很酷，只是不善表达而已，雨中的父爱不会因雨水有丝毫衰减，反而更显炽热。

养育